

# 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的 先秦德育思想探析

邓铃威, 谢科峰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娄底 417000)

**[摘要]**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与《忠信之道》蕴含着丰富的德育思想,是我们研究这一时期德育思想发展的绝佳范本,两篇简文主要包含有“尊贤尚德”与“崇尚忠信”的内容,在德育方法上则分别强调统治者道德示范作用和“慎言力行”,前者重在培养“君子”人格,而后者则意在培养“君子”人格。探析两篇简文蕴含的德育思想,对于完善当代社会德育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郭店楚简; 唐虞之道; 忠信之道; 德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K87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712(2019)05-0122-07

先秦时期是我国古代德育思想形成的源头,此前我们对于这一时期德育思想的认识,主要来自古代典籍的记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地下简帛古书的出土,为我们的相关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郭店楚简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本文选取《唐虞之道》与《忠信之道》两篇简文为代表,旨在通过对其德育思想进行分析,管窥这一时期相关思想的形成及发展的趋势,增进对先秦学术活动规律的认识,以此拓展相关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

## 一、郭店楚简相关文献概述

之所以选取郭店楚墓竹简中《唐虞之道》与《忠信之道》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原因之一是这两篇简文具有的独特性和联结性,这突出表现在竹简形制和竹简性质两个方面。

### (一) 竹简形制

简牍形制集中表现为简帛的外在形态特征,对郭店楚简的形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先秦时期古文献的文化形态。郭

店楚简各篇形制各异,不同形制竹简所承载的文献性质不同,了解相关简文的形制,便于我们分辨不同形制简文性质之间的差别。

根据荆门市博物馆所编写的《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分类,按照简长将竹简分为三类,第一类长度为32.5厘米左右,第二类长26.5-30.6厘米,第三类长15-17.5厘米。按照形状分为两类,一类竹简两头平齐,另一类的两侧削成梯形<sup>[1]</sup>。其中,《唐虞之道》共有竹简29枚,竹简两端平齐,简长28.1至28.3厘米,属于中长简,编线两道,编线间距约14.3厘米;每简容字一般在25字左右,因竹简残破,只能缀连成数段文字,其大意仍可了解<sup>[1]157</sup>。《忠信之道》共有竹简9枚,竹简两端也平齐,简长28.2至28.3厘米,亦属于中长简,每简容字29至34字不等,编线两道,编线间距13.5厘米。因个别简文上有编纶痕迹,可知两篇皆属于先写后编类型的竹简<sup>[1]163</sup>。综上我们可以大致知道两篇竹简形制相近,很有可能是一类同一性质的文献,故选取二者放在一起研究,有益于我们深入了解、探究其中的内容。

**[收稿日期]**2019-05-29

**[作者简介]**邓铃威(1997—),女,湖南双峰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届本科毕业生;谢科峰(1978—),男,湖南邵东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本文通讯作者,研究方向:先秦文献。

## (二) 竹简性质

对于《唐虞之道》和《忠信之道》这两篇竹简的性质分析,我们可以从竹简的出土年代和墓主人身份切入研究。就成书年代而言,郭店一号墓的下葬年代可以作为其直接判定依据,发掘者认为郭店一号墓具有战国初期偏晚的丧葬特点,其下葬年代应在公元前 4 世纪中期至 3 世纪初<sup>[1]163</sup>。因此,我们可以将两篇竹简归为战国中期的文献材料。

郭店一号墓墓主人身份问题,学界一直多有讨论,意见不一。而其身份的判定对于本文两篇竹简性质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李学勤先生曾谈到“书籍用来殉葬必然是死者生前读用或爱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是死者身份和思想倾向的反映”<sup>[2]</sup>。而郭店一号墓中出土的大量竹简,包含有多篇古籍,内容主要涉及道、儒两家学说,因此李学勤先生判断墓主生前可能是一位“兼习道、儒的博通学者”。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被整理者释为“东宫之杯”的漆耳杯应该释为“东宫之师”,即“太子的老师”之意,而其墓葬中《老子》《子思子》等抄本,或即用为太子通读的教材<sup>[3]79</sup>。一些专家学者则把墓主人的身份进一步具体化。刘宗汉先生认为“东宫之师”很可能就是楚顷王之师<sup>[3]79</sup>;姜广辉先生认为墓主极有可能是《孟子滕文公上》中的陈良<sup>[4]</sup>;廖名春先生则推断其可能是孔子七子之后学,尤其是子思之徒的可能性最大<sup>[5]</sup>。

总之,目前学界关于墓主人的身份还没有定论。但总结各家之说,我们可以大致认定墓主人是一位兼习儒、道的老年男性学者。由上文的分析以及“生前读用或爱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是死者身份和思想倾向的反映”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推测墓中竹简是为教育东宫太子而挑选编撰的。两篇竹简所蕴含的德育主题也可以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研究。

## 二、郭店楚简相关文献德育思想探析

郭店楚简的相关简文反映了先秦时学术活动的原貌,蕴含着丰富的德育思想。对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和《忠信之道》中所蕴含的德育思想进行

研究,分析其德育内容和方法揭示其可能的德育目标,从而尽可能的展示先秦时期德育思想的原貌,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尽可能让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先秦德育思想。

### (一) 德育内容

#### 1. 《唐虞之道》——“尊贤尚德”

《唐虞之道》是郭店楚简中一篇专门论述尧、舜禅让历史故事的思想专著,其论述主体是针对当政者,从分析尧舜禅让这一问题出发,指出当政者应当加强自我的修身立德,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以德配天。简文特别重视道德品质对于统治者的约束作用,认为统治者欲王天下先需拥有高尚的道德品质,这是其先决条件(“今之戴于德者,微年不戴,君民而不骄,卒王天下而不喜。”)。而这种对当政者的道德要求,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存在着“尊贤尚德”的风气。

简文随之展开它的论证思路,以尧舜禅让过程中所展现的具体德行,如仁义、孝悌等道德品质对其进行阐述,简文指出“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可见,简文将“禅让”与“爱亲”“尊贤”联系起来,把对统治者个人的“孝”“尊贤”等具体道德要求普及到爱及天下百姓,一方面体现了统治者道德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尊贤尚德”的政治伦理要求。

在我国古代众多文献中都曾指出,在上古时代政权的转移主要是通过“举贤禅让”的方式实现的。所谓禅让,即为在上古时代改朝换代时,政权在统治者非法定的继承者中的非暴力转移。在《唐虞之道》中也是以唐尧虞舜禅让的历史故事作为简文的开端,在开篇就开宗明义,指出“汤吴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王位的传承不是传子而是“授贤”,提出“禅而不传,圣之盛也。”简文强调“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我义而未仁也。古者虞舜笃事瞽叟,乃戴其孝;忠事帝尧,乃戴其臣。”其论述思路为将“禅让”上升到统治者的个人道德品质层面,使禅让有了道德意义,同时将个人家庭伦理上升到政治伦理,把“爱亲”“孝亲”与“忠君”“尊贤”联系在一起。这体现出先秦时期以来儒家话语体系的一个显著

特色,政治史即为政治道德史,二者紧密相联不可分割,尊贤是其结合关键,禅让则是具体表现形式,从而又回归到其论述的核心德育内容。

《唐虞之道》其核心思想“尊贤尚亲”的主要实现途径禅让,即统治者将权位授予贤者,这是早期儒家一直推崇的政治主张,亦是儒家学者时刻记忆的历史记忆。如篇文中所言“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上德,则天下有君而世明,授贤,民举效而化乎道。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明确指出“不禅”是“生民未有”的,这表明传位授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一种大范围的历史记忆,为众人普遍接受。简文指出权位的非禅让式传递可能导致政治局势混乱由此引发战争,如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自立为王”所引发问题不在少数,像田氏伐齐、三家分晋等著名的历史事件皆是如此。因此在简文中作者引述《虞诗》中“大明不出,万物皆暗。圣者不在上,天下必坏”来表现出对现实政治深深的担忧,进而强调贤人政治的必要性。

## 2. 《忠信之道》——“崇尚忠信”

《忠信之道》篇中列举了“忠信”的各种表现,最终将其归结为“忠,仁之实也,信义之期也”“忠”“信”以及“忠信”是先秦时期儒家忠信道德中重要的内容,在古代德育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忠信之道》我们可以管窥到先秦时期儒家有关“忠信观”的具体表现和演变历程,这也是《忠信之道》此篇所具有的独特学术价值与意义。

所谓忠信,“忠”在先秦时期有两种含义,一是尽心竭力诚恳待人,二是事君的一种德行即忠君;“信”亦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个人的道德准则即践行对他人的承诺,二指在政治层面,即统治者赢得民心的一种条件,这是对统治者提出的建议。在《忠信之道》都有涉及到二者的不同含义,在开篇指出“忠”“信”的内涵分别为“不讹不孚”“不欺弗知”,并且再次指出“忠信而民弗亲信者”是“未之有也”。进而强调“忠”“信”的重要性。至于“忠”“信”的具体表现作者将之归结为“不欺罔”与“不背”,即为拥有“忠”“信”的君子是不会欺骗他人和背弃诺言的,这也是为“忠”为“信”的实践途径。全文的核心在于文章最后提出的“忠,仁之实也。

信,义之期也。”这也是全文画龙点睛之笔,其大意可以理解为“忠是仁的实质”,换言之即忠信是仁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简文将“忠信”与“仁义”放在一起讨论,这是本文的“忠信观”的一个独特之处。这是简文作者赋予“忠信”的独特意义,进而彰显作者的政治立场。

纵观全文,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忠信之道》篇中“忠信观”的具体内涵和实践途径,但从其深度来看,还是有值得探索和思考的问题。如简文作者将“忠信”之地位上升到天地的高度,提出“不夺而足养者,地也。不期而可要者,天也。似天地也者,忠信之谓此。”将“忠”与“地之德”“信”与“天之德”进行比较,指出“忠信”可以养育万物。由此可见“忠信”地位之高。且简文中“忠信”也并非“忠”与“信”的简单集合,而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只是这种糅合相对而言是比较粗糙的。其次简文论述“忠信”时,屡次提及“至忠”“至信”,如“至忠如土,化物而不伐;至信如时,必至而不结。”“大久而不渝,忠之至也,陶而睹常,信之至也。至忠无讹,至信不倍,夫此之谓此”与简单的忠信观剖析的更加深入。并且提出“忠人无讹,信人不倍”相对而言比较低层次的道德标准,以及提及“似天地也者,忠信之谓此”这样的高层次的道德标准,二者相互对比,使得忠义具有层次性。综上所述可知,《忠信之道》中所论述的“忠信观”与后来的“忠信观”存在一定的差异,有利于丰富我们对于先秦时期有关“忠信观”的认识。

## (二) 德育方法

### 1. 《唐虞之道》——统治者道德示范作用

《唐虞之道》篇重点体现的是统治者的道德示范作用,这符合先秦儒家在德育方法方面注重身教示范和反躬自省的传统,也契合了其历来所秉持的一种观念,即广大民众的道德品质、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主要取决于君主的道德品行,而广大民众只是被动的趋附者。在《荀子·君道》中亦有类似观点,如“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指出君主的价值追求对百姓具有价值导向作用,就是我们常说的“上行下效”。因此在《唐虞之道》中阐

述权位禅让时,十分重视“尚贤”,强调君主的表率作用,亦是出于此种考虑。诚然,现在看来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英雄史观,但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下,“上行下效”的客观现象是真实存在的,如果上位者自身无德,其可能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这是简文作者十分警惕的。

在先秦时期的道德教化手段中,主要以法律刑罚和道德教化为主,而君主在道德教化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当时许多人看来,统治者作为道德表率为人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人民在获得道德知识后,树立了正确的道德价值进而落实到自身的道德实践,这也是统治者的价值所在,具有治本的功能。在《孟子·公孙丑上》中就曾有过“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的看法,可见君主道德示范在当时而言是有其合理性因素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其存在的缺陷,就是在现实生活中,能够谨守道德规范为民表率的统治者毕竟是少数,因此我们不可夸大其功效,同时也要留意到道德示范作用带有人主观性,它不可避免的带有自身的影响因素,具有不稳定性,这也是我们在探析《唐虞之道》中德育内容所需要留意的。

## 2. 《忠信之道》——“慎言力行”

先秦儒家历来注重教化,在实践中总结了许多德育方法,以教育过程的主体为标准进行分类,可主要分为自我教育和他人教育,其中在《忠信之道》中更多侧重于自我教育。而自我教育的可行性主要是建立在儒家人性论的基础上,既然众人都有为善的可能与意愿,那么只要通过合适正确的方式引导受教育者参与到教育过程中来,自我教育就有具体的可操作性。其中“慎言力行”就是受教育者进行自我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在简文《忠信之道》中论述“忠”“信”时指出讲究“忠”的人是不欺骗人的,讲究“信”的人是不会违背诺言的,此句实际是在分析言行之间的关系,认为说出去的话要真实并且化之为具体的实践。因此《忠信之道》中所倡导的“忠信”不仅是一种道德品质,更是一种实践要求。

在简文中具体表述了注重言行一致君子的表现,如“口惠而实弗从,君子弗言尔;心(疏而貌)

亲,君子弗申尔”,指出话说得好听却做不到以及心中疏远而表面亲近,心中所想与具体实践不一致时,这不是君子的行为。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简文的作者对于言行关系所持的观点。其中指出君子(尤指统治者)的忠信之行甚至可以感化四周的少数民族使其亲附,足以看出简文作者眼中“慎言力行”的影响力。除此之外,在后来许多儒家文献中,我们也能看到“慎言力行”其发展延续的痕迹,表现出这一观点具有良好的继承性,说明其在德育方法的效果上有独特的价值,符合社会的价值追求和统治者的利益需要,在历史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值得我们重视。

## (三) 德育目标

### 1. 《唐虞之道》——“圣人”人格

在先秦儒家的观念里推崇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圣人得王位,认为这样“圣人”就能教化民众安定天下。先秦儒家历来称赞的圣王典型为上古时期的尧舜和夏商周三代时期的文武二王,这些“圣王”都被认为是具备了非常高的道德素养。他们通过自我道德修养以致“内圣”,从而通过“禅让”达致“外王”。这一政治模式在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中亦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简文作者对王位的继承者提出极高的道德要求,意有“非圣人莫能称王”的意味,这样就形成了对于统治者道德方面的一个具体目标,即拥有“圣人”人格。要求统治者作为道德上的精英,以自身道德表率作为治国的根本。

在《唐虞之道》中“圣人”人格达成需要达到“爱亲”“尊贤”并且拥有好的天时地利。如简文所言“夫圣人上事天,教民有尊也;下事地,教民有亲也;时事山川,教民有敬也;亲事祖庙,教民孝也”对统治者的道德品质提出具体要求,体现在要“事天以尊”“事亲以孝”“事山川以敬”等,简文的作者希望通过宣扬这些思想实现全国民众以君主这一道德精英马首是瞻。也要注意天时地利这一因素对于“圣人”人格形成的影响,即圣人也应具备某种神秘的资质。正如简文所言“古者尧生为天子而有天下,圣以遇命,仁以逢时”。在“爱亲尊贤”这一贤德品格上加上一丝神秘色彩,说明圣人

也需做到“圣以遇命”“仁以逢时”，从而将具有“圣人人格”的统治者与君子进行区分。这与后来《孟子·滕文公上》一书中提出的“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即成圣是人人皆可为之，有所区别，体现了先秦时期统治者的德育目标内涵的变化过程，对于我们探析先秦时期德育思想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 2.《忠信之道》——“君子”人格

先秦儒家从人的道德品质出发，建立理想人格目标，主要可以分为“圣人”“君子”“士人”，其中关于“君子”人格是儒家文献论述最多和最详细的，因为相对于在现实生活中普通百姓难以企及的“圣人”这一至善至美的人格目标，“君子”的人格目标则更加具有现实性，是儒家理想道德人格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为普通百姓进行文化学习、道德修养提供可行的可行性目标。所谓君子在先秦儒家看来应该是德才兼备之人，其中“君子”人格主要的侧重点则在君子的道德品质修养方面，而儒家所强调道德品质主要为“六德”，即仁、义、礼、智、忠、信。

在《忠信之道》篇中对六德中的“忠”“信”“仁”“义”四种具体德目进行阐述，提出君子与这四种德目的关系，如“忠人无讹，信人不倍。君子如此，故不诳生，不倍死也”，明确指出君子是十分注重忠信的，甚至做到“不倍死也”。同时简文将“忠”“信”与“仁”“义”二者结合，提出“忠，仁之实也。信，义之期也”，意为“忠是仁的本质，信是义的必至”，这表明“君子”人格必备的六德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然而，我们要注意到《忠信之道》的德育目标是达成“君子人格”，但在简文中具表现的是内在的心性修养，我们知道“君子”人格的形成还要遵循外在的行为规范，即礼乐规范，这也是简文中没有涉及的，但这并不影响其德育目标的具体内涵。

## 三、郭店楚简相关文献德育思想价值

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所蕴含的丰富的德育思想资源，对于我们了解并推进传统德

育思想研究具有重要作用。在当今新的时代形式下，我们的德育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及挑战，也需要我们挖掘其独特的实践价值。

### （一）推进传统德育思想研究的进展

对郭店楚简中相关文献德育思想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先秦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奠基和形成的重要时期，了解这一时期的德育发展便于我们厘清传统德育思想理论体系的脉络，明晰古代德育思想发展历程，推进传统德育思想研究的进展。

具体来说，郭店楚简相关文献的研究对推进传统德育思想研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使我们更为清晰的了解了传统德育思想的内涵及其发展脉络。我们以“德治”思想和“忠信”思想为例。首先，“德治主义”的历史传统是先秦时期德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强调统治者的德行，是当时备受推崇的一种政治模式，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以前我们在研究这一重要的德育思想传统时，主要的研究点在于突出统治者“修德”的重要性，而在《唐虞之道》篇中有在强调这一关键点外，同时也关注到“修身”与“修德”二者的联系。其次，在前文分析《唐虞之道》德育内容时，我们可以看到先秦儒家有一个“忠孝并举”的德育特点，这在所载简文“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我义而未仁也”中就有体现，这种特点贯穿了整个古代德育思想体系。在强调家国一体的封建社会，这也是必然发展的结果，认识到这些能让我们更理解传统德育思想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内涵。

第二，有助于我们丰富相关学术史的认识。长期以来，由于焚书坑儒和多次兵燹，先秦时期的典籍流传下来的极少。而且伴随着秦汉之际书同文的要求，先秦的典籍都经历了一次由“古文”改写为“今文”的过程。这些事件，最终致使我们对于先秦的文献内容和学术活动知之甚少，难免产生不少错误的观念，比如长期以来，我们认为诸子之间处在竞争的关系，因此彼此之间一定会有森严的壁垒，相互之间的观点难以一致。但从本课

题研究的相关简文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就以《唐虞之道》所涉及的“禅让”之说为例,这个观念是先秦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历来为学界所重视。传统上都认为这个观点出自《尚书》,是儒家的思想。但是近代以来,以顾颉刚、童书业二先生为代表的疑古派学者提出禅让起源于墨家<sup>[6]</sup>,将这一问题的讨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像《唐虞之道》这样的出土文献出现,我们发现,“禅让”作为一种思潮,在先秦时期曾经普遍地存在于各个学派之中。具体来说,先秦古书的流传多以单篇为基本单位,加之竹简这一特殊的流转载体,使其分合无定,具有非常强的灵活性,而这一时期知识权威的缺乏,更推动了这一趋势的发展<sup>[7]</sup>。因此,“禅让”的观念并不是先秦某一家特有的观念,而是大家可以共享的公共思想资源。可见,厘清这一观念,丰富了我们对于相关学术史的认识。

第三,有助于我们完善对儒家学术传承的认识。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而其创始人孔子去世之后到后来的孟子、荀子继起之间漫长的时间里,我们对这期间儒家的传承和发展知之甚少,而郭店楚简的发现,有力地弥补了这一空白。对于我们研究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联系本文所研究的两篇简文来看,其皆是先秦佚篇,许多观念和后来的汉儒有着明显区别。故对这些楚简的研究,必将有力地推动我们相关研究的进展,完善我们对于先秦儒家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认识。

总之,新的文献材料出土有利于我们突破研究过程中遇到的瓶颈,继续推进相关的传统德育研究。细致深入考察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这一批材料有助于我们丰富具体的德育内容,更新相关的德育方法。

## (二) 促进当代社会德育实践的发展

先秦德育思想是我国儒家德育思想的源头,在我国的教育史上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当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之中,我们要从过去的优秀思想文化当中汲取营养,为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其中,郭店楚简这一珍贵历史文献的出土,给我们的研究和学习提供了新的契

机,使我们可以追本溯源、博古观今,解决当今形势下的德育难题,重拾文化自信。

在当今新的时代形势下,我们在具体的德育过程中面临各种问题及挑战,这就要求我们从历史上汲取优秀的德育思想传统加以学习和借鉴。其中郭店楚简两篇简文中蕴含的“统治者道德示范作用”以及“慎言力行”的德育方法在先秦时代背景下发挥了独特作用,至今仍具有其借鉴意义。在儒家的描述中,先秦时期统治者与各级士大夫官僚阶层不仅是政治的主干力量,在全社会肩负着道德示范和表率作用,这一观念直至现代社会仍有一定影响,在整个社会民众的眼中,政府的上层官员以及学术界的知识精英仍是我们社会的道德风向标。

在当今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面对一系列复杂的现实环境和现实问题,有些官员受到官僚主义的侵蚀,出现了腐败问题,在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些学术不端的行为,这些“失范”行为令人咂舌,而由此带来的“涟漪效应”会给社会大众带来错误的道德示范,造成负面影响,形成不良的社会风气,并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鉴于此种问题,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官德的培养,这也符合我们党历来重视的思想建设工作、把思想工作放在重要位置的做法,同时也应呼吁知识分子秉持好自身的道德操守,在社会发展中发挥自身的道德教化作用。

## 参考文献:

- [1] 荆门市博物馆. 郭店楚墓竹简·前言[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 1.
- [2] 李学勤. 关于“东宫之师”的讨论[J]. 简帛研究二〇〇一,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44.
- [3] 李学勤. 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J]. 中国哲学, 第20辑.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79.
- [4] 刘宗汉. 有关荆门郭店一号楚墓两个问题: 墓主人身份与儒道兼习[J]. 郭店楚简研究: 390-395.
- [5] 姜广辉. 郭店一号墓墓主人是谁[J]. 郭店楚简研究: 396-399.
- [6] 顾颉刚. 古史辨: 第七册: 下[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30.
- [7] 谢科峰. 早期古书流传问题研究: 以相关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比较为例[D]. 上海: 上海大学, 2015.

## Analysis of the Thoughts on Moral Education in the Pre-Qin Period Manifested in *Doctrines of the Tang and the Yu Dynasties* and *Principles of Loyalty and Faith* in Guodian Bamboo Slips

DENG Ling-wei, XIE Ke-feng

(School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of Humanit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oudi 417000, China)

**Abstract:** Guodian bamboo slips are a batch of bamboo slips of the Chu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they were unearthed in Guodian Village, Jingmen City, Hubei Province. Among them, *Doctrines of the Tang and the Yu Dynasties* and *Principles of Loyalty and Faith* are two important documents of pre-Qin Confucianism and contain rich moral education thoughts. The two texts mainly contain the content of "respecting virtues" and "advocating loyalty and faithfulness". In the method of moral education, they emphasize the role of the moral model of the ruler and the principle of "cautious words and more practic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s to explore the progress of traditional moral education research and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education practic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by exploring the concrete moral education thoughts contained in the two brief articles.

**Key words:** bamboo slips of Guodian; *Doctrines of the Tang and the Yu Dynasties*; *Principles of Loyalty and Faith*; thought of moral education

(责任编辑: 舒阳晔)

(上接第 121 页)

## History and Enlightenment of Zhuhuo Dragon Dance of Houtian Village in Shuangfeng of Hunan Province

PENG Xiao-jun, LONG Song-ju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Hunan University of Humanit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oudi 417000,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applies literature, field investigation, logic analysis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Zhuhuo Dragon Dance in Houtian Village. It is founded tha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can be divided into six periods, namely, origin, formation, interruption, recovery, prosperity, and regression. Zhuhuo Dragon Dance is facing problems such as aging of players,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less inheritors and shortage of fund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lk custom of dragon dance requires a strong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he development of sound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courage to innovate and strive to improve their own value.

**Key words:** folk dragon dance; Zhuhuo Dragon Dance; development history

(责任编辑: 吴俊英)